

# 客籍军阀、本土豪绅与江西土地革命

张兆金 游海华

(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,江西 南昌 330022)

[摘要] 民国初年至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江西一直为客籍军阀所统治。客籍军阀、本土豪绅两大势力集团交织下的地方社会,成为当局统治的薄弱环节,客观上极大地有利于江西土地革命的兴起和发展。中国共产党人抓住这一有利时机,对基层社会进行了有效动员,促使江西革命力量得以迅速发展。

[关键词] 客籍军阀 本土豪绅 江西 土地革命

[中图分类号] K263(56) [文献标识码] A [文章编号] 1004-6917(2008)07-0117-04

针对土地革命在江西的兴起这一问题,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作了相关研究。研究者对学界的传统观点,如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国内尖锐的阶级矛盾、土地占有的不均和农民的极端贫困引发土地革命等提出了某些质疑,其关注重点逐渐聚焦到地方社会结构和当地所处的历史环境上来。本文从社会史的角度,着重分析了客籍军阀、本土豪绅两大势力集团交织下的地方社会,是如何成为当局统治的薄弱环节,并客观上有利于江西土地革命兴起和发展的。

## 一、客籍军阀的统治与中央权威的散失

近代以前,江西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,其社会相对封闭。近代以来,在西方列强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下,江西地方经济与社会结构经历了深层变动,并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失衡状态。20 世纪初中国政局的动荡更加剧了这一进程。辛亥革命爆发以后,以李烈钧为代表的一批有影响的江西籍国民党人,曾试图在江西进行一系列改革,壮大本土势力。但是“二次革命”后,李纯率所部北洋军阀第六师进犯南昌,李烈钧逃日,欧阳武被捕,革命势力遭到袁世凯军队的残酷镇压,使得江西“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

比那一省都弱”<sup>[1]</sup>。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,江西仍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本土统治集团。

北洋军阀在江西的统治从李纯督赣开始,中经陈光远、蔡成勋、方本仁、邓如琢,历时 14 年(1913 年至 1926 年)之久。江西五任赣督,尽管每任任期都很短,且属于不同的派系,但都是由北京政府所任免,相互间没有发生过直接武装冲突,各军阀主政江西后基本上沿用前一任的政策。因此,表面上看来,江西的统治较为平稳。实际上,客籍军阀统治江西期间,极少任用江西人做官,也不招江西人当兵,而用其从家乡招来的子弟兵。正是由于驻江西的军队都是客军,其中大都以同乡故旧结成关系,因而与地方本土势力不可能有切身利益,“他们对江西地方建设毫无兴趣,唯一关心的是自己的位子和钱袋子”<sup>[2]</sup>。中央权威以北洋军阀在江西的统治而得以延续。

客籍军阀统治江西时期,江西的社会经济并没有得到相应发展。以近代江西工业为例,虽然所设工矿企业有所扩增,但与全国其他各省相比,仍然缓慢得多,整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,规模较大的企业只有 20 家,只占全国 902 家的 2.2 %<sup>[3]</sup>,没有达到其应占有的比例。新旧军阀通过加捐加税向农民搜刮大量税款,加重了农民的负担。江西东南的瑞金县,

[收稿日期] 2008-01-20

[作者简介] 张兆金(1983-),男,江西南康人,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2006 级硕士研究生;游海华(1972-),男,江西丰城人,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,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博士后研究人员。

“自民十一以来,叠驻大军,兵差供应,所费甚巨”<sup>[4]</sup>;会昌县从筠门岭到西江短短 180 里路,就设有 9 个“厘金卡”,来往江西、广东之间挑脚贩卖的小商小贩,受尽关卡盘剥之苦<sup>[5]</sup>。20 世纪 30 年代初,江西各县的苛捐杂税,“总计有二百九十八种之多”<sup>[6]</sup>。农民除负担正赋以外,还需交纳附税,其数为正赋的“百分之三百”<sup>[7]</sup>。

由于上述政治之高压,经济之掠夺,导致北洋军阀与江西地方豪绅存在较深的矛盾,加之其对江西经济建设并无多大贡献,缺乏民众基础,因此其统治很不稳固。

国民党新军阀统治时期,中央权威逐渐散失。北伐军于 1926 年 11 月攻占南昌后,滇系军阀朱培德凭借手中掌握的军权占据江西,任省政府主席。朱培德的军队来自云南,只掌握本部的第三军两个师和收编的杨如轩、杨池生的兵力,势力较弱。其统治尚不到一年,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之余部,进军罗霄山脉,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。朱培德的滇军在江西没有切身利益,只求保住其赖以生存的地盘,因而将其防御的重点放在国民党其他派系上,这一点可以从其 1927 年 11 月份的军队部署看出来。朱培德将第三军八师布置在万载(临湖南长沙),七、九师在修水(接近湖北、湖南两省),第九军的二十七师在樟树,二十八师在抚州一带<sup>[8]</sup>。朱培德调集部队集中在江西北部,以应付国民党其他军事势力的侵入并为自己准备退路,第九军沿江西东部到福建一带驻守,实际上等于放弃江西西南,不与井冈山的红军实力相拼。1929 年 9 月继任的湘系军阀鲁涤平,其属下只有张辉瓒、谭道源两师,另有许克祥第二十四师归其节制,实力与朱培德差不多。但此时红色政权已相继建立,成为鲁涤平难以应对的力量。

此时,统治阶级内部也是矛盾重重,“主要的为蒋与反蒋的冲突,其次则为土著豪绅与外籍军阀的冲突。这两个冲突,普遍于江西全省”<sup>[9]</sup>。其矛盾的根源则为地盘和军队,二者是军阀赖以生存的根本。为了争夺地盘,各派军阀之间已是剑拔弩张,突如其来的武装暴动,又使原有的矛盾更加激化。为了应付来自基层社会的革命,统治者虽然就镇压革命暂时达成一致,但是在实际的围剿中却相互推诿,勾心斗角,不能配合。1929 年的早春,蒋介石派遣了 11 个团封锁东固革命根据地,但此时的他为了争夺中

央的领导权,正与桂军交战,因此无法像封锁井冈山那样派遣精锐部队来封锁东固山区。蒋介石所派的军队是战斗力较弱的福建军队,朱德曾尖锐地指出其实质:“福建军队不过是加入国民党的职业土匪,奉令来封锁东固……他们唯一的要求是,能够躲在自己的老家不受干扰地抽税和贩卖鸦片。”<sup>[10]</sup>身为滇系军阀首领的朱培德与蒋介石矛盾也颇深,“滇系军队之所谓剿匪,除乘机夺取湘系已占领之地盘或改编当地的反动地方武装,以充实其自己力量外,对于‘共匪’,并未曾努力剿过”<sup>[11]</sup>。

客籍军阀虽然在江西防着被蒋介石吞噬,但又不得不顺从蒋介石,加入其与其他军阀的混战中。例如,1928 年春,朱培德所部第五路军参加二次“北伐”,结果“受了老蒋种种的限制与压抑,未得一点利益”<sup>[12]</sup>。中国共产党则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迅速在江西发展力量,而在江西的军阀也就不可能拿出更多的兵力来应付革命武装。比如东固暴动时,其周边地区敌人军事力量薄弱,赣西赣南四五十县仅驻二十七师和七师两师人,且战斗力均弱<sup>[13]</sup>。其部署为:二十七师以七十九团守永新,八十一团守遂川,八十团守泰和、万安、吉安仅有师部直属军队六百人,七师则大部集中赣州,派少许部队赴寻乌、兴国镇压暴动<sup>[14]</sup>。

总之,1931 年底之前的江西在客籍军阀统治下,主政者更换频繁,相互间勾心斗角,统治基础薄弱。客籍军阀与中央及地方豪绅均有着很深的矛盾,江西经济虽有所发展但远远落后于全国其他省份,人民的生活处于动荡不安之中。在这样一种政治经济格局之下,江西逐渐游离于中央权威之外,成为各种矛盾和冲突的交织地,为土地革命初期革命力量的兴起和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。

## 二、本土豪绅与江西地方社会

在传统社会里,县以下的社会控制主要依靠地方绅士,而不是国家官僚体系。但是自清末科举制度取消后,这种依靠地方精英进行非正式控制的体系逐渐瓦解,地方精英日益向城市迁移。至民国时期,客籍军阀在江西的统治仅仅依靠贫弱的军队,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十分松散,土豪劣绅开始取代原有的地方精英成为“地方领袖”,地方社会成为各种矛

盾的交织地。饶伟新对土地革命前夕江西南部农村社会矛盾的研究发现,在江西南部一带,除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外,还有土客籍的分立对抗、宗族割据和家族主义的盛行,以及地方政治派系林立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分化和社会矛盾问题<sup>[15]</sup>。

江西本土豪绅多表现为姓氏与宗族的利益共同体,其构成了乡村权力的核心,宗族的运作方式不仅得到当地农民的高度认同,而且它的权力触及乡村的每一个角落。兴国早期革命领导人之一的陈奇涵谈到,赣南“氏族社会的传统习气浓厚,规模宏大的宗祠到处林立。性情强悍好斗,每因发生个人纠纷都缠到氏族上来解决,调解不成,战祸即开”<sup>[16]</sup>。另一位革命亲历者肖华回忆:“那时,兴国的姓氏观念很浓厚,肖、陈两姓在兴国很有势力,兴国的伪商会会长历来都姓肖,伪县长来兴就任时都要拜过肖以钱。”<sup>[17]</sup>

乡村权力结构不仅仅以宗族和姓氏为中心,还呈现出横向发展的趋势。民国初年的于都县,有县绅洪氏兄弟分别创办了于水中学和昌村中学,新学的创办带来了土绅的分野,自此以后,“地方土绅分为两派,不入于雩水即入于昌村,旗帜鲜明……而两校学生毕业回归本乡者,其情亦复如是”<sup>[18]</sup>。据《江西文史资料》第八辑丘佃的《回忆于都暴动》,于都“全县的土豪劣绅,当时分成了昌村与于水两派对峙,两派之间既有勾结又有倾轧……凡是想在地方上混饭吃的知识分子,不依附于昌村派就得拜倒于水派下,否则就无进身之阶”。乡村集团的权力纷争尽管非常复杂,既有新旧观念之间的分歧,又有国民党“左派”和“右派”之争,还夹杂着国共两党间的摩擦与分裂以及地方上的宗族矛盾、土客矛盾等,但是几乎所有的斗争均围绕着争夺地方教育、财政、建设、政权等核心内容而展开,并最终汇集到对县级政权的争夺。陈德军的研究显示,革命爆发前,多种复杂的政治力量,在江西东北各个县城进行了激烈的角逐;县城里的政治分裂,无可避免地削弱了本来就不是很有效的对乡间腹地的统治<sup>[19]</sup>。但是,由于特殊的地理、政治、文化等环境,江西始终没有形成全省的共同利益集团。

革命爆发之初,本土豪绅成为首要的打击对象,力量薄弱的军阀不能对其提供有效的保护,导致大批本土豪绅向城市逃生。贵溪县的省议员汪楚书、

龙虎山上第53代张天师等地方名流人物,纷纷逃亡上海。寻乌县最大的地主潘明征全家流亡梅县,另一个大地主邝明经,也“全家走尽”;《寻乌调查》所列举的113个地主中,明确载明“全家走尽”或“逃走了”的有20家<sup>[20]</sup>。1930年的江西西部,“地主豪绅在乡村跑得精光”<sup>[21]</sup>。本土豪绅的逃离,使原本一盘散沙的乡村权力结构变得更加混乱。而留在乡村的小批本土豪绅则自发组成地方武装。据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所编的《江西党史资料——东固革命根据地专辑》第十辑,东固大地主王初曦在东固暴动后,积极纠集富田、新圩、陂头、值夏等地豪绅地主,购买武器,组织100多人的“五市联防”武装,多次进扰东固苏区。因兵力不足,军阀政府还与本土豪绅勾结,大办靖卫团,一时间靖卫团“布满了各县市和乡村”。但是,本土豪绅的武装都是各自利益的联合体,大都以乡、村地域为单位,难以统一起来,不少地方武装还“互相仇视或冲突,安福地方的靖卫团曾被商民靖卫团与西乡洋溪靖卫团缴械一次,吉水靖卫团第二五队与三四一队在暗中冲突,吉安西区四都靖卫团与永安靖卫团互相仇视”<sup>[22]</sup>。遂川、永新的保安队也分为数派,“常起纠纷”<sup>[23]</sup>。靖卫团虽日渐扩大,但战斗力很小,而且由于靖卫团所收捐税太多,不得人心,因此,本土豪绅武装不可能抵挡各地革命武装。

面对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,本土豪绅与客籍军阀虽达成暂时的一致,但二者之间的许多矛盾不能调和,有时甚至在围剿过程中发生冲突。1927年底,方志敏先后领导弋阳九区三千农民举行秋收暴动和横峰年关大暴动。弋横暴动的胜利让客籍军阀深为惊恐,于是从南昌调来国民党三十一军一个团六百多人,在两百多支枪的当地靖卫团的协助下,重新占据了弋阳、横峰两县城<sup>[24]</sup>。来自云南的滇军在此次围剿中,因为不关切切身利益,只是表面轻于应付。本土豪绅武装与客籍军阀的矛盾与冲突是有其根本原因的,即他们之间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,在面对各地武装暴动时各有各的打算,难以有效地进行围剿。

“八七会议”以后,江西许多地方党组织都依照上级指示发动了秋收暴动,几乎同时在江西广大县域举行了武装暴动。风起云涌的革命暴动牵制了力量薄弱的客籍军阀,搅乱了本已失衡的江西地方社会。由于客籍军阀与“中央政权”和地方豪绅没有形

成利益共同体,因而原本存在着的种种矛盾和冲突,在革命到来之时变得更加激化,从而为江西土地革命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社会条件。

综上所述,民国初年至20世纪30年代初的江西一直为客籍军阀所统治。客籍军阀的目的只是抢占地盘和掠取钱财,无心地方经济建设;与江西本土豪绅也不和睦,整体战斗力不强,且与其他军阀勾心斗角。因此,客籍军阀在江西没有深厚的统治基础。北伐战争发动以后,在新军阀的统治下,江西日益游离于中央权威之外,新旧军阀的更替加剧了这一过程。地方本土豪绅以宗族为单位结成单个的利益集团,革命暴动使江西豪绅又结成薄弱的地主武装,但相互间矛盾重重,几乎不能与革命武装相抗衡。正是上述矛盾和冲突,使得客籍军阀和本土豪绅两大势力集团在土地革命初期,难以统一并形成强有力的战斗力。最终,中国共产党人利用这一有利时机,对基层社会进行了有效动员,促使江西革命力量得以迅速发展。

#### [参考文献]

[1]毛泽东选集:第一卷[C].北京:人民出版社,1966:103.

[2]温锐,游海华等.百年巨变与振兴之梦——20世纪江西经济研究[M].南昌:江西人民出版社,2000:146-147.

[3]北洋军阀时期全国工矿企业统计表[A].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.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:第三辑[Z].南京:江苏人民古籍出版社,1986:337.

[4]瑞金旅省同乡为桑梓呼吁[N].江西民国日报,1930-11-05.

[5]中共赣州地委党史工作办公室.赣南人民革命史[M].北京:中共党史出版社,1998:6.

[6]胡家凤.十年赣政之回顾与展望(1)[A].赣政十年[Z].南昌:江西省政府《赣政十年》编委会,1941:23.

[7]国联专家视察江西报告(一)[J].经济旬刊,1934,(7-8).

[8]中共江西省委致中央信(1927.11.30)[A].江西省档案馆,中央档案馆.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(1927-1928)[Z].

[9][11][12][21][22][23]江西省档案馆,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.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(上)[C].南昌:江西人民出版社,1982:85;185;3;340-341;72;18.

[10][美]艾格妮丝·史沫特莱.伟大的道路:朱德的生平和时代[M].梅念译,北京:三联书店,1979:279.

[13][14]江西省档案馆.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[C].南昌:江西人民出版社,1986:24;23.

[15]饶伟新.论土地革命时期赣南农村的社会矛盾——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土地革命史研究[J].厦门大学学报,2004,(5).

[16][17]陈毅,肖华等.回忆中央苏区[Z].南昌:江西人民出版社,1981:1;390.

[18]于都观感记[N].江西民国日报,1935-02-11.

[19]陈德军.乡村社会中的革命——以赣东北根据地为研究中心(1924-1934)[M].上海:上海大学出版社,2004:116.

[20]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[C].北京:人民出版社,1982:115-124.

[24]方志纯.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[M].北京:人民出版社,1980:25.

[责任编辑:黎伟盛]

[校对:龙家勇 黎伟盛 李玉萍]